ISSN：3080-2660
EISSN：3080-2679

认知语言学视角下盛唐诗歌音乐意象生成初探

曾 洁

江西应用科技学院，江西 南昌 330000

摘 要：认知语言学是语言学领域颠覆性的重要分支，兴起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，其打破了传统结构主义语言学仅聚焦语言内部结构、脱离人类体验与思维的研究局限。认知语言学核心观点即语言并非独立的符号系统，而是人类认知思维、身体体验与社会文化共同作用的产物，语言的表达逻辑本质上是人类认知世界、解构世界、表达情感的思维投射。其中，隐喻、转喻等核心理论，为文学意象的生成、解读与传播提供了全新的研究范式，尤其适用于解读诗歌中抽象感知的具象化表达机制。在盛唐音乐诗歌中，音乐本身是无形、无状、瞬时性的听觉艺术，无法被文字直接精准描摹，而诗人正是依托人类通用的隐喻、转喻认知思维，将抽象的听觉体验转化为可视、可感、可悟的诗歌意象，完成了音乐艺术到文学艺术的跨界转化。基于此，本文立足认知语言学核心理论，结合盛唐经典音乐诗歌文本，探析隐喻、转喻机制下盛唐诗歌音乐意象的生成路径、表现形态与艺术价值，挖掘诗歌意象背后的人类认知规律与盛唐文化内核，为古典诗歌意象研究提供新的理论视角。

关键词：认知语言学；盛唐诗歌；音乐意象

DOI：10.64649/yh.jydk.issn3080-2660.202611043

1 核心概念界定与理论溯源

1.1 认知语言学核心理论：隐喻与转喻

传统修辞学将隐喻与转喻视为单纯的语言修饰手法，仅服务于文本的艺术美化，是小众的、刻意的文学表达技巧。而认知语言学彻底重构了二者的本质内涵，人类对抽象、未知、无形事物的认知，必须依托具体、已知、有形的生活经验与事物感知完成，这一认知转化过程，正是隐喻与转喻的核心运行逻辑。

认知隐喻的核心是“跨域映射”，即人类将熟悉的具体事物认知域（源域），投射到陌生的抽象情感、感知、概念认知域（目标域），通过具象事物的特质解读抽象事物的内涵。在诗歌创作中，隐喻实现了“抽象情感 / 感知—具体物象”的思维转化，是诗歌意象生成的核心认知机制。而认知转喻的核心是“邻近关联替代”，基于同一认知框架内事物之间的邻近性、关联性，以凸显的、具体的事物指代关联的抽象事物或整体概念，侧重同一认知域内的替代与深化，具备聚焦认知、简化表达、强化感知的认知作用。二者相辅相成，共同构成了古典诗歌意象生成的核心思维基础。

1.2 诗歌音乐意象的内涵演变与认知本质

“意象”是中国古典文论的核心范畴，其理论渊源可追溯至《周易·系辞》中“圣人立象以尽意”的经典命题。此处的“意”指主体的思想、情志、体悟，“象”指自然万物的客观形态，古人以具象之象承载抽象之意，初步构建了“意生于心、象形于外”的思维范式，为后世文学意象理论奠定了基础。魏晋南北朝时期，意象理论正式融入文学创作，刘勰在《文心雕龙·神思》中提出“独照之匠，窥意象而运斤”，明确界定了文学意象的核心内涵：意象是诗人主观情志与客观物象的有机融合，是创作者通过感知、构思、提炼形成的审美载体，标志着意象理论正式成熟。传统文学视角下，诗歌意象是情景交融的艺术产物，是诗人寄托情思的客观物象。而从认知语言学视角来看，诗歌意象的本质是人类认知经验的文学化呈现，是概念隐喻与转喻思维的具象化结果。

2 盛唐诗歌音乐意象中的隐喻认知体现

音乐作为纯粹的听觉艺术，具有无形性、瞬时性、抽象性的特质，高低起伏的音色、轻重缓急的节奏、细腻复杂的乐情，均无法通过直白的文字精准描摹。而认知隐喻的跨域映射功能，完美解决了这一表达难题，成为盛唐诗歌音乐意象构建的核心认知手段。诗人依托日常生活中可感、可视、可知的自然物象、人文景观，将具体物象的特质映射到抽象的音乐感知中，实现了“听觉认知”向“视觉、触觉、情感认知”的多维转化，让抽象乐声变得立体可感、意境悠远。盛唐诸多音乐诗均依托隐喻思维构建经典音乐意象，其中李贺《李凭箜篌引》是隐喻构建音乐意象的巅峰之作。“昆山玉碎凤凰叫，芙蓉泣露香兰笑”两句，以四重经典物象为源域，将不同音色、情感的箜篌乐声作为目标域，构建了多重精准的认知隐喻，全方位描摹出李凭弹奏箜篌的绝妙音效。首先，“昆山玉碎”构建了高亢清脆的高音音乐意象。

整体来看，这四句诗依托四重认知隐喻，将单一的听觉体验转化为视觉、触觉、情感、文化多维融合的审美体验，构建了层次分明、

ISSN：3080-2660
EISSN：3080-2679

质感丰富、意境悠远的音乐意象。隐喻思维打破了音乐艺术的瞬时性与抽象性局限，让转瞬即逝的乐声定格为永恒的文学意象，实现了音乐艺术与诗歌艺术的完美融合，这也是盛唐音乐诗历经千年依然极具审美感染力的核心认知根源。

3 认知隐喻对盛唐诗歌音乐意象的建构价值

在盛唐诗歌音乐意象的生成体系中，隐喻并非简单的文字修饰，而是核心的认知建构机制，具备拓展意象内涵、具象化抽象感知、寄托主体情志三重核心价值，从表层表达到深层内涵全方位赋能音乐意象的艺术建构。

3.1 拓展意象层次，丰富文化内涵

未经认知转化的音乐，仅为单纯的听觉声响，不具备情感属性与文化内涵，而隐喻的跨域映射功能，为音乐意象赋予了多元的感官层次与深厚的文化底蕴。诗人在运用隐喻构建音乐意象时，所选取的物象均承载着深厚的传统文化积淀与大众通用的认知经验，物象自带的文化属性会自然投射到音乐意象之中，让单一的听觉意象升级为复合型审美意象。以《李凭箜篌引》为例，“昆山玉”“凤凰”“芙蓉”“香兰”四类物象，均是中华传统文化中的经典审美符号，各自承载着独特的文化内涵与情感寓意。昆山玉的珍贵高洁、凤凰的神圣祥瑞、芙蓉的温婉凄美、香兰的清雅悠然，这些根植于民族文化的认知共识，通过隐喻映射完全融入箜篌乐声之中。原本单纯的乐曲声响，不再只是高低起伏的听觉声波，而是兼具高贵、神圣、温婉、灵动的复合型艺术意象。

3.2 具象化抽象乐感，降低审美门槛

音乐的抽象性导致其难以被文字精准定义，直白的描摹往往空洞乏味，无法让读者产生共情。而认知隐喻依托人类通用的身体体验与生活认知，以具象物象解读抽象乐感，搭建起作者与读者之间的认知桥梁。诗人的听觉体验是私人化、瞬时化的，而自然物象是大众化、常态化的，读者无需亲身聆听乐曲，即可依托对物象的固有认知，精准复刻诗人的听觉体验与审美感知。盛唐诸多音乐诗均依托这一认知逻辑实现审美共情。除李贺诗作外，白居易《琵琶行》中“大珠小珠落玉盘”“间关莺语花底滑”等经典诗句，同样以隐喻思维构建音乐意象。

3.3 寄托主体情志，深化诗歌意境

认知隐喻的本质是主体认知体验的投射，诗人选取何种物象隐喻乐声，并非随机选择，而是自身情感、审美、心境的主观筛选与投射。音乐意象在隐喻机制下，不再是单纯的艺术描摹，而是诗人情志的载体，实现了“乐声—物象—情志”的深度融合。李贺在《李凭箜篌引》中选取高洁神圣的玉、凤凰、兰、芙蓉等物象，而非世俗凡物，本质上是对李凭箜篌技艺的极致推崇，暗含诗人对高雅艺术、纯粹风骨的追求与赞赏。“芙蓉泣露”的凄婉意象，也暗藏诗人自身敏感细腻、孤高清冷的心境，让乐曲的哀怨之美与诗人的人生体悟相互契合。隐喻思维让音乐意象突破了单纯的艺术描摹，成为诗人抒发审美追求、寄托内心情思的媒介，让诗歌意境不止于音乐之美，更兼具人文情怀与思想深度。

4 盛唐诗歌音乐意象中的转喻认知生成表现

相较于隐喻的跨域映射，认知转喻基于同一认知框架内的邻近关联，以具体代抽象、以局部代整体、以具象代无形，是盛唐诗歌音乐意象生成的另一重要认知机制。音乐的抽象性使其难以被直接指代，而乐器、乐声场景、演奏形态等均与音乐存在紧密的邻近关联，属于同一音乐认知框架。盛唐诗人熟练运用转喻思维，通过关联物象指代抽象音乐，简化表达、强化感知、烘托意境，构建出简洁凝练、意蕴深远的音乐意象。白居易《琵琶行》、岑参《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》、李白《春夜洛城闻笛》等经典诗作，均蕴含成熟的转喻认知机制。诗人以具体可感的“管弦”乐器，转喻抽象无形的宴饮音乐，摒弃了“无音乐相伴”的直白枯燥表达。从意象生成效果来看，“无管弦”不仅精准表达了宴席无乐的状态，更依托乐器自带的审美特质，构建出清冷孤寂的场景意象。管乐的清亮、弦乐的温婉本可为宴席增添欢愉氛围，而“无管弦”则直接消解了场景的热闹感，精准烘托出诗人与友人离别之际的落寞、遗憾、清冷心境。转喻思维让简单的场景表述升级为兼具画面感与情感性的音乐意象，以具象之物承载抽象之情，极大提升了诗歌的艺术表现力。

5 认知转喻对音乐意象的转换与深化作用

认知转喻在盛唐诗歌音乐意象建构中，具备深化认知感知、转换表达视角、丰富意境层次、融合多元文化四大核心作用，与隐喻相辅相成，共同完善了盛唐音乐意象的生成体系，让诗歌的音乐表达更具层次感与感染力。

5.1 简化认知难度，深化意象感知

转喻依托大众熟知的具象物象指代抽象音乐，能够快速激活读者的固有认知经验，简化对抽象乐声、乐境的感知难度，强化音乐意象的具象质感。音乐本身无形无状，难以被精准

ISSN：3080-2660
EISSN：3080-2679

捕捉，而乐器作为音乐的载体，形态具体、特质鲜明，读者可通过乐器的材质、形制、发声特点，反向推导乐声的音色、节奏与意境，让抽象的音乐意象变得真切可感。《琵琶行》中“无管弦”三字，依托读者对管、弦乐器的固有认知，快速唤醒大众对古典宴饮音乐的听觉记忆，无需繁琐描摹，即可让读者直观感知到宴席空寂、无乐助兴的清冷状态。这种认知转化方式，贴合人类由具象到抽象、由熟悉到陌生的认知规律，极大提升了音乐意象的传播效果与共情能力。

5.2 转换表达视角，丰富诗歌层次

传统音乐描写多直接聚焦乐声本身，表达视角单一、内容单调，极易陷入同质化描摹困境。而转喻思维能够切换表达视角，跳出乐声本身，从乐器形制、演奏场景、器物特质等关联维度切入，多角度构建音乐意象，让诗歌表达更具新意与层次感。岑参《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》中“中军置酒饮归客，胡琴琵琶与羌笛”，是转喻视角创新的典型代表。诗人并未直接描摹宴饮的乐声如何热闹、乐曲如何繁复，而是通过列举胡琴、琵琶、羌笛三种特色乐器，以乐器物象转喻整场宴会的音乐演奏效果与热闹氛围。三种乐器分属不同地域、不同风格：胡琴沉郁浑厚，自带边塞苍茫质感；琵琶清脆激昂，兼具灵动与热烈；羌笛高亢辽阔，饱含边塞苍凉悠远之意。从认知视角来看，诗人避开了直白的听觉描摹，以视觉物象带动听觉想象，切换了音乐描写的表达维度，让诗歌画面更立体、意境更丰富。同时，三种胡汉乐器的同台呈现，也暗含盛唐胡汉文化交融、兼容并蓄的时代特质，让音乐意象兼具艺术价值与时代文化内涵。

5.3 凝练诗歌语言，升华意境情志

转喻以局部代整体、以具象代抽象的认知特质，能够以极简的文字承载极丰富的内涵，让诗歌语言凝练精妙、意蕴悠长。盛唐诗歌讲究炼字炼意，追求“言有尽而意无穷”的审美效果，转喻思维恰好契合这一创作追求。寥寥数语的物象指代，即可唤醒读者丰富的听觉联想、场景联想与情感联想，实现语言简洁性与意境丰富性的统一。李白“谁家玉笛暗飞声”中，“玉笛”二字以极简的物象，既指代了笛曲乐声，又暗含乐声的清雅悠远，更烘托出深夜洛城静谧空灵的氛围，同时为后文“何人不起故园情”的思乡情志铺垫意境。玉笛的清幽、笛声的悠远、夜色的静谧、乡愁的绵长多重意境交融一体，均源于转喻思维的凝练赋能。转喻让音乐意象不再是单纯的艺术描摹，而是情志与意境的融合载体，有效升华了诗歌的审美境界与思想内涵。

6 结语

盛唐诗歌音乐意象的生成，并非单纯的文学创作技巧运用，其底层逻辑是人类通用的认知思维机制。认知语言学的隐喻与转喻理论，为解读盛唐音乐诗歌的意象生成规律、艺术魅力与文化内涵提供了全新的研究维度。隐喻依托跨域映射的认知逻辑，将抽象无形的音乐听觉感知，转化为可视、可感、可悟的自然物象与审美场景，实现了乐声质感、意境、情志的全方位具象化，为音乐意象赋予了深厚的文化内涵与多元的审美层次。转喻依托同一认知框架的邻近关联，以具象乐器、器物物象指代抽象音乐，简化了认知难度、转换了表达视角、凝练了诗歌语言，让音乐意象更具画面感与共情力。从认知语言学视角解读盛唐诗歌音乐意象，能够跳出传统文学赏析的表层维度，深入挖掘诗歌创作背后的人类思维规律，厘清古典意象生成的底层逻辑。这一研究视角不仅能更深刻地体悟盛唐诗歌的艺术魅力与文化底蕴，也能为古典诗词的解读、传承与创新研究提供全新的理论支撑，助力中华优秀古典文学文化的深度挖掘与传播传承。

参考文献：

[1] 李敬民，李鲲 . 音乐隐喻的艺术哲学批判 [J]. 星海音乐学院学报 ,2019,(4):78-85.

[2] 张松松，汪少华 . 音乐符号的认知语言学研究：基本层范畴化视角 [J]. 西安外国语大学学报 ,2016,24(3):60-64.DOI:10.16362/j.cnki.cn61-1457/h.2016.03.014.

[3] 郑锦扬 . 中国古代音乐意象论的历史轨迹与理论特色 [J]. 艺圃（吉林艺术学院学报),1992,(Z1):44-49.DOI:10.13867/j.cnki.1674-5442.1992.z1.010.

作者简介：曾洁（1995.06—），女，汉族，安徽蚌埠人，讲师，研究方向：中国音乐文学、声乐演唱与教学。